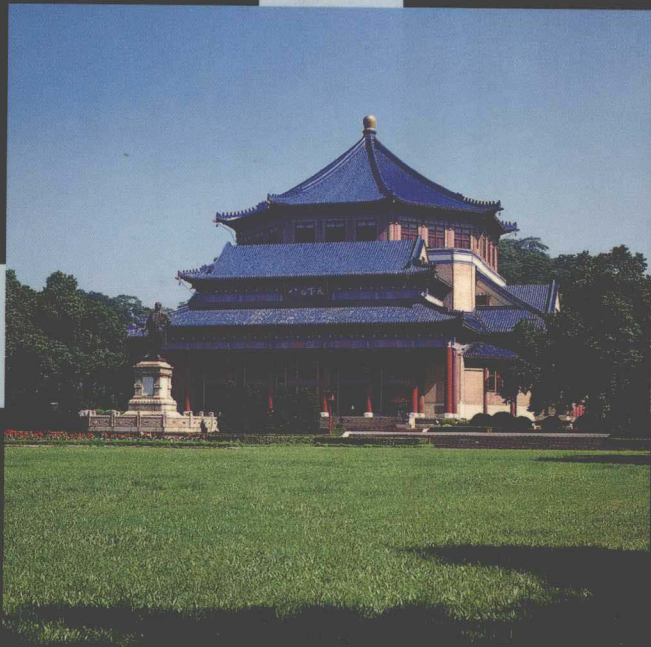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

1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

1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

建築藝術 1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本卷主編 吳光祖

責任編輯 王伯揚 吳宇江

版面設計 蔡宏生 趙 力 王 可

責任校對 翟美芝

責任印製 趙子寬 朱 筠

出 版 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西郊百萬莊 100037)

發 行 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新 華 書 店 總 店 聯合發行

製 版 者 北京廣廈京港圖文有限公司

印 裝 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199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12-03347-0/TU · 2588 (8491)

國內版定價: 350 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凡例

- 一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是《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中國美術全集》60卷古代部分的後續延伸，二者為有機的組合體。
- 二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分繪畫、雕塑、工藝美術、建築藝術、書法篆刻等編，每編分若干卷。
- 三 本卷為建築編的第一卷。
- 四 本卷內容分三部分：(1) 論文 (2) 圖版 (3) 圖版說明。

中國現代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顧問	古元	張仃	關山月	王琦	周幹峙
主任	劉玉山				
副主任	王伯揚	陳宏仁	張文學	劉建平	
委員	(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伯揚	朱乃正	朱秀坤	李路明	周韶華
	吳鵬	林瑛珊	陳宏仁	陳惠冠	奚天鷹
	常沙娜	張文學	張炳德	程大利	楊力舟
	靳尚誼	趙敏	劉玉山	劉建平	錢紹武
	鍾涵				

本卷主編: 吳光祖

總體設計: 呂敬人

前言

中華民族的文化，從時間久遠來講，已有五千多年歷史，這是中外人士都知道的；從覆蓋的面積來講，可有若干萬平方公里的區域，也是中外人士都已看到的；若從它的構成因素來講，恐怕瞭解的人士就比較不太多了。

無論研究中華文化史或欣賞由此文化所構成的美術品的人，沒有不驚歎它的燦爛、豐富而有應接不暇之感的。如果探討其原因所在，就會理解到絕不可能僅是某一時代、某一地區、某一民族所能獨自創造完成的。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族之間自古即隨時隨處，互相習染、互相融合，才有現在所見的驚人燦爛的文化及其成果。

世界歷史上有不少幾千年前已建立的文明古國，但至今已不存在或雖仍存在却曾中斷過一段時間的并不少見。而我們中國則綿延數千年歷史未曾中斷，甚至某個事件的日期，古史書上的記載可以和出土文物銘刻相吻合。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雖也曾有些小段為某些兄弟民族掌了政權，但他們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份，沒有割斷中華文化傳統，所以說中華文化是五千多年綿延未斷的文化，可稱當之無愧的。

幾年前，中央宣傳部組織了衆多的文化、文物工作的專家，編成《中國美術全集》六十大冊。出版以來，讀者眼界大開，這六十冊書起到了現有的任何博物館及任何文化藝術史的論著都無法取得對人民的啓發、教育作用。事實很簡單，無論哪個博物館，哪部研究、介紹這類學術的著作，都不可能同時擁有這些陳列品和實物

的直觀插图。凡有過閱讀、研究這類書籍的人都知道，讀千百字的文字說明，不如看一眼實物，那麼能一次瀏覽這些圖片，豈不“勝讀十年書”！

現在我國文化、教育事業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地擴充、提高。文史書籍的搜集、重印，以及從種、角度加以整理傳播，已取得普及與提高的極大效果，而美術方面也不容無所擴展、充實。由於原六十冊的內容難以盡納各個時代的代表作品，而且新發現的文物珍品也有待補充。更有些近、現代的優秀作品，反映中國文化藝術新發展的，過去還未及選編，現在亦應納入。於是領導上再次組織羣力，在以前六十大冊的基礎上翻成幾倍，編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預計約有三百餘冊。這部新編巨著中，藝術種類雖然變動不大，但在每一種類中并非只數量加多，重要在盡力增加具有代表性的名品。

本書所收各類藝術名品，以國內、境內公、私所藏為主，國外、境外藏品中最重要的名品具有代表性的，也酌量收入。至於近期最新發現以及最近出土的，由於編輯印刷工序關係未及補充，俱有待於續編工作。

這部巨著成書，我們雖然足以自慰，但從中華文化中美術類的全部來說，還有很大的距離，希望本書的讀者，尤其是世界的廣大專家，能把它看成是中華文化中美術部份的扼要介紹，才較符合實際。現在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共同敬願廣大讀者予以指正！

啓功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中國近代建築體系的形成與建築藝術特徵

吳光祖

中國近代建築是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大約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內在中國形成的一個新建築體系。這個建築體系不是中國固有的經過幾千年發展形成的以木結構為基礎的傳統建築體系的延續，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封建社會解體、資本主義因素增長的過程中發展形成的。其主要特點是，按照不同的功能要求，出現了不同於中國傳統建築的多種新的建築類型，採用了比中國傳統の木梁架結構先進的磚木混合結構和西方近代新出現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和鋼結構。多種多樣的建築型制打破了傳統的以木構開間為基礎的單體建築和院落組合型制的單一模式。在建築藝術形式上則沿襲了西歐資產階級革命以來建築創作中復古革新所形成的主要建築樣式以及世界其他地區不同時期的一些建築樣式，也包含了中西文化交融過程中，復興傳統建築藝術所創造的中國式新建築。

中國近代建築領域內的這種變革首先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入侵後被迫開埠的城市，尤其是設有租界的大城市裏發生的。在這些城市裏，列強建造了為他們政治、經濟利益服務的和生活用的歐式建築：從起初的磚木結構到後來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以至鋼結構，從低層到多層以至高層，建築類型逐漸遍及生產、生活各個領域。一位偉人在論及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時說過：“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也將慢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在建築領域裏，可以斷言，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在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一定會吸收西歐近代建築的成就，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傳統的以木結構為基礎的建築體系，因受傳統の木構技術與佈局方式的限制，很難產生出適應近代社會所要求的建築類型和建築型制；儘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傳統的建築體系在中國廣大地區仍然在繼續發展，甚至隨着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會館、作坊等建築類型和建築型制還有所進展，但只要資本主義有更大發展，生產、生活提出新的需要，傳統建築就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歷史舞臺。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民在吸收先進的西方文

明的過程中付出過慘重的代價；曾經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深重苦難也終於成了過去，那些曾經有着不光彩歷史的歐式建築完全改變了性質，顯示出其本應有的歷史、文化和審美價值，成了中國近代社會遺留下來的一份可寶貴的建築遺產。儘管有些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近代建築已經消失，或者經過不慎重的“修整”，失去了原有的風采，但把近代建築作為歷史文物保護對象終於提上了日程。回顧一下中國近代建築體系的形成過程，了解其所呈現的建築藝術特徵，揭示其所具備的審美價值，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中國近代建築體系的形成

中國傳統建築，在其數千年的發展長河中，雖然在各個歷史階段、各個朝代、各個地區有一些不同的風格特徵，但作為一個體系，一脈相承，基本上沒有顯著的變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儘管也曾受到過如古印度和伊斯蘭建築文化的影響，產生過中外文化的交融，但這種影響和交融只是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中國傳統建築，或者如伊斯蘭建築在局部地區從總體上吸收形成特定地區的中國伊斯蘭教寺院，而中國傳統建築作為一個獨特的建築體系，始終沒有改變其基本面貌。至於發展時間同樣悠久的歐洲建築體系，在它發展、延續的歷史過程中，隨著時代的變遷，建築技術的進展，建築類型和建築型制的豐富，形成一個內容與形式總在不斷變化的建築體系，但它對獨特的中國建築體系基本上沒有發生過重大影響，只是在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侵入澳門和17世紀末、18世紀中清朝政府開闢廣州為對外通商口岸以後，葡萄牙人在澳門建造的房屋和在廣州建造的供外商居留的十三行商館（即“十三夷館”）才在中國國土上出現了最早的成片成街的歐式建築（圖1）。至於外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建立的基督教堂，可以追溯到13世紀末14世紀初在元大都建立的三座教堂，據記載教堂具有“高聳之鐘樓”，也許是中國國土上最早出現的西式教堂。16世紀中葉，西方傳教士熱望叩開中國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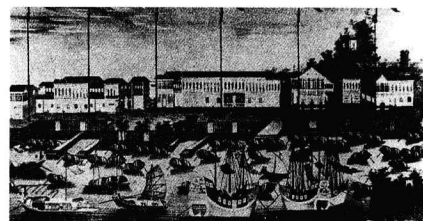


圖1 1821年的廣州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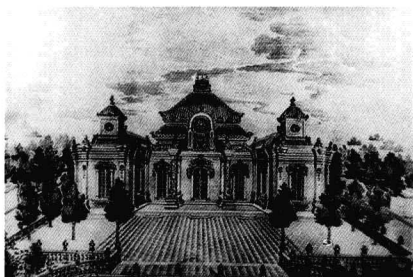


圖 2 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遠瀛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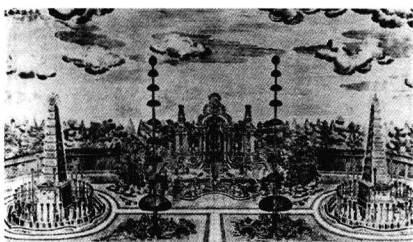


圖 3 圓明園長春園西洋樓——大水法

門，起初的傳教活動還只限於葡萄牙人佔領的澳門，至今在澳門還留有當時建造的幾座教堂，其中包括著名的“大三巴”教堂僅存的正面山牆在內。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馬竇在葡萄牙人支持下，於公元1582年（明萬歷十年）奉派來中國傳教，受明朝萬歷神宗皇帝特准於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到達北京，並親自督教了宣武門附近的天主堂——南堂。此後，直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末年，天主教在中國廣為傳播，到1667年（清康熙六年），中國境內天主教堂已達一百八十餘座，其分佈幾乎遍及關內東部各省。這些教堂有的是採用了中國傳統建築式樣，如1605年（明萬歷三十三年）建造的北京南堂和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上海的敬一堂。即使是歐式的，包括18世紀初康熙年間重建的南堂等，因為宗教活動畢竟是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這類建築的興建，對中國傳統建築體系也沒有產生什麼重大影響。公元1745年至1759年（清乾隆十年至二十四年）在圓明園東部和長春園內，由意大利耶穌會士郎世寧等人設計，建造了一組具有意大利巴洛克建築式樣的西洋樓（圖2、圖3），則是在中國宮廷內，為滿足皇帝的獵奇心理，出現的歐式建築。圓明園的西洋樓以至廣州的十三行商館，雖然其某些建築處理手法和裝修裝飾式樣，為後來宮廷建築和民間建築所做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建築審美觀念，但對於中國傳統的建築體系也沒有產生重大衝擊。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西歐列強以炮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43年至1844年，廣州、廈門、上海、寧波、福州五個通商口岸先後開埠，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前夕，列強迫使中國開埠的通商口岸已達34處，在有些開埠的城市內，又違約强行劃定租界，獲取租界內的行政管理權和土地永租權，設立行政機構（一般稱“工部局”）以及司法、警察、稅收、市政管理等機構，甚至攫取中國港口、海關的管理權。列強在租界內建造了各種類型的建築物，如領事館、

工部局、兵營、警署、洋行、銀行以及供生活享樂居住用的飯店、俱樂部、公寓、花園、住宅等。這些建築物大多是兩三層磚木結構，具有印度、東南亞一帶英國殖民地外廊式建築或做文藝復興式的歐洲古典建築樣式。例如上海 1872 年建造的英國總領事館（圖 4）、1896 年建造的法國領事館（圖 5），早期建造的英商怡和洋行、匯豐銀行、匯中飯店、理查飯店、英國總會等，都是在上世紀 50 年代至 90 年代先後建成的這類樣式的建築物。教堂建築在 19 世紀下半葉，隨着傳教士獲得自由傳教的權利，在開埠的城市以至內地城市都有建造，房屋結構多為磚木結構，建築形式有耶穌會巴洛克式、法國哥特式、羅馬風式以至中西混合的樣式，不少城市至今仍留有這一時期的教堂建築的遺跡。

19 世紀 60 年代至 90 年代，清朝統治者中一部分洋務派人士，嚮往列強船堅炮利，爲了“制內”、“禦夷”、“求富”、“圖強”的目的，發起了一場洋務運動。其主要內容是借助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大規模地興辦軍事工業并圍繞軍事工業開辦其他企業，建立以新式武器裝備的陸海軍。洋務派所創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其廠房佈局和建築型制雖然有些仍然採取中國傳統方式，有的連建築形式都是傳統的樣式，如 1870 年擴建的天津機器製造局就是如此，但也有不少採用了新的建築佈局和引進的磚木結構以至鐵結構建築技術，建築形式也採取洋房式樣，如 1865 年建立的上海江南製造局，1866 年建立的福州船政局。1893 年建成的由英國工程師設計的漢陽鐵廠，其中六個大廠的廠房竟都採用了“鋼屋架承重、鋼製樑柱、鐵瓦屋面”。

在中國的民間建築方面，在開埠的城市的租界內，由於人口增加和地價上漲，開始出現以中國傳統的毗連式三間兩廂或五間兩廂院落住宅爲單元採取連排式佈局的里弄住宅。如 1872 年建造的上海興仁里，以五間兩廂和後院披屋爲單元作連排式佈局，這是把傳統的院落住宅同外來的連排式佈局相結合，形成新型制住宅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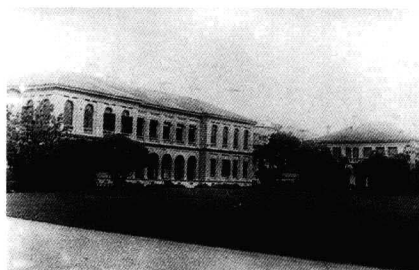


圖 4 上海英國領事館



圖 5 上海法國領事館（1896 年）

的最早實例。

19世紀下半葉出現的這些建築現象，雖然在地域上、範圍上還有所局限，但已不是個別的偶然現象。一方面是外來的輸入，一方面是洋務需要的引進以及適應新的要求所形成的中西結合，說明西方文明正開始衝擊中國的古老建築傳統，似乎正在醞釀着一個新的建築時代的到來。

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後，列強迫使清朝政府繼續開闢通商口岸，至20世紀初，開放的通商口岸增至七十餘處。在上海、天津、漢口，一些已佔有租界的國家屢次擴展範圍；一些後來入侵的國家也紛紛要求設立租界：漢口至1898年設有五國租界，天津至1902年竟有八國租界。有的租界由一國專管，有的租界由幾國共管，稱為公共租界。列強還根據1901年的《辛丑條約》迫使清朝政府在其首都北京劃定使館區，於是就出現了東交民巷這一違背國際法准則的特殊區域。管區的行政權、土地權、司法權由各國公使行使，各國軍隊可在使館區界址附近設置保衛綫以保護各國使館。此外，列強還利用“租借地”這一特殊形式劃定自己的勢力範圍：膠州灣、旅順、大連、九龍、威海衛、廣州等地區先後成了德俄英法等國的租借地。與劃分勢力範圍相適應，列強還爭相奪取中國鐵路、礦山的投資權和修築權，以至出現“鐵路附屬地”這樣的佔有方式。哈爾濱、旅順、大連為俄國所獨佔，青島為德國所獨佔。日俄戰爭後，旅順、大連以及長春、瀋陽的鐵路附屬地和第一次大戰爆發後的青島又都為日本所獨佔。在設有租界的城市裏，外國列強進一步以資本輸出的方式開工廠、辦企業、設銀行、開辦各種事業。在一些由一個國家獨佔的城市裏，製定了城市發展規劃，並付諸實施。北京的使館區，進行了各國使館和兵營的建設。19世紀末，正是西歐建築科學技術長足進展的時代，鋼和混凝土應用不久就被引進中國。隨着各種事業的發展，同時帶來了新的建築類型。19世紀末至20世紀10年代，新的建築類型如火車站、郵政局、百貨公司、游

樂場、戲院、影劇院等開始建造。開埠之初所建的磚木結構房屋，不少開始用混凝土材料翻建。混凝土材料起初用於鋼樑樓面的填充材料，如1896年建造的上海工部局市政廳，1901年建造的上海華俄道勝銀行、1903年建造的哈爾濱中東鐵路管理局大樓和1905年建成的青島德國總督府等都採用了這種鋼樑混凝土樓面，磚石牆承重的混合結構。鋼筋混凝土結構也在同時起用：1904年建造的廣州嶺南大學馬丁堂，可能是中國近代已知的最早採用鋼筋混凝土樓面，磚牆承重的混合結構建築物。1905年建造的漢口平和打包廠，廠房是一座四層外牆承重、內部為多跨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建築物，外貌簡潔。1908年建造的上海德律風公司大樓，是一座六層鋼筋混凝土全框架結構的建築物，可能是存留下來的中國最早的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的建築物，但它的外貌卻呈現巴洛克式樣的裝飾包裝。鋼結構最初是用於工業建築作鋼屋架，鋼框架結構最先也是用於工業建築。1913年建造的上海楊樹浦電廠一號鍋爐房可能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鋼框架結構的建築物。在民用建築中最先採用鋼框架結構的是1916年建成的上海有利銀行大樓，樓高六層，轉角處有高起一層的塔樓。20世紀頭20年，大部分開埠城市和租借地城市新建的房屋建築已形成城市建築的主體，這些建築物在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同時，在低層建築中大多仍然採用磚木結構或磚牆、混凝土樓板、木屋架的混合結構。建築外貌大多具有歐洲古典的或集做各種式樣的折衷主義樣式，十里洋場的中國近代城市面貌開始形成。有些城市是由一個國家獨佔經過統一規劃進行城市建設的，則具有比較統一的城市面貌，如1897年至1914年德國統治下的青島，1905年以前俄國佔領下的大連，則分別具有德、俄兩國的建築風貌。而哈爾濱則是呈現出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西歐和俄國流行一時的新藝術運動建築作風的延續。教堂建築在20世紀初無論是重建的或是新建的，基本上與19世紀下半葉在中國出現的幾種樣式相似，只是在哈爾濱出現了具有拜占廷傳統的俄羅斯

東正教堂的樣式，基督教堂出現了像 1910 年建造的青島福音堂和同年建造的北京亞斯立堂帶有新的樣式成份的折衷主義樣式。

20 世紀初，清朝政府在鎮壓了 1889 年的“百日維新”運動以後，爲了抵制革命，也打起了推行“新政”、“預備做行憲政”的幌子，着手“釐定官制”、“製定法律”、“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設置了一些新的政府機構，開辦了一些新式學堂：如大理院、陸軍部、外務部迎賓館、軍諮府、郵傳部、度支部以及資政院、各省諮議局等，恢復了 1895 年洋務運動期間創辦的北洋大學堂和 1898 年“百日維新”時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創辦了清華學堂以及幾處師範學堂、中學堂，創立了大清銀行、京張鐵路局等機構。這些衙署、學堂的建築物大多是兩三層的磚木結構房屋，外貌做歐洲古典式或折衷主義樣式。

20 世紀初外國教會在中國各地開辦了不少高等學堂，如 1901 年創辦的蘇州東吳大學，1905 年上海聖約翰大學，1910 年成都華西協合大學，杭州之江大學，1911 年南京金陵大學，1915 年金陵女子大學，1914 年長沙湘雅醫學專科學校，1916 年廣州嶺南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和北京協和醫學堂，1917 年濟南齊魯大學等。這些學校的校舍建築物採取了新的佈局和型制，建築形式絕大多數採用了中國宮殿式的傳統樣式，是中國近代建築中體現中西文化交融所創造的最早一批新型中國式建築。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早在 19 世紀 70 年代就有所發展，到 1894 年中國民族資本開辦的工礦企業已達七八十家，但規模較小。1895 年以後，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才較前有初步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工業大多是紡織、食品等輕工業，廠房大多爲磚木混合結構。多層廠房普遍採用了鋼筋混凝土結構，如 1912 年創辦的上海福新面粉廠，於 1913 年建成的六層廠房就採用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廠房建築形式大多數採用了具有發券門窗的西方建築樣式，不少工廠的廠區大門還具有巴洛克建築的特徵。

在一些舊城市或城市的舊城區，一些傳統的舊式商店，受西方建築的影響，出現了洋裝修的“洋式店面”。不僅在北京，在其他城市也風行一時。舊式商店在佈局上也開始有所變化，如北京前門外大柵欄一帶，有些綢布店採取天棚覆蓋天井的辦法，擴大營業面積，在門面上採用洋式裝修以招徠顧客。又如北京的東安市場，原是一處清朝八旗練兵場，1903年起，自發的連排式一、二層商店形成縱橫交錯的街弄，於街弄上搭建天棚，商店內容包括多種行業，形成一種具有獨特佈局的大型綜合商場，並為其他城市所做效。到20世紀10年代，已出現以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的多層的綜合購物與娛樂的大型百貨商店，如1915年建成開業的上海先施公司和1917年建成開業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是新型百貨商店的先例，其建築外貌具有折衷主義的特色。在有些城市的舊城區，如哈爾濱道外的商業街，不少磚木結構的三、四層的商店，採取了歐式建築的佈局和型制，却在店面上滿佈中西式樣混合的裝飾，有人把這種建築稱之為“中華巴洛克”，形象地說明了這類建築的特徵。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住宅建築也有顯著的發展。1910年以後，上海的里弄住宅改變了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以毗連式院落住宅為單元的連排組合，採取單開間或雙開間的連排組合，這種組合方式的里弄住宅也在其他一些城市如漢口、南京、天津等地出現。這時期的里弄住宅多為兩層磚木結構房屋，並開始出現洋式的裝修裝飾，如有弧形或三角形山花和壁柱裝飾的門罩、洋式的門窗、欄杆和裝飾紋樣等。1900年前後，在上海、青島、哈爾濱等地建造了不少為租界工部局董事、外國領事、洋行大班以及中國官僚、民族資本家所使用的高級獨院式花園住宅。這類住宅，一般建築面積很大，可達四五百平方米，住宅面向庭院花園，有齊全的生活使用房間和輔助房間，一般為一、二層，磚木結構，有的還設有火牆壁爐。建築形式多為西方古典主義或文藝復興等樣式。哈爾濱、青島的獨院式住宅常常帶有歐洲新建築運動所出現的新藝術運動和德國



圖 6 20 世紀初的上海外灘

青年風格派建築處理的特徵。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 20 年代前大約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內，西方近代所形成的各種新的建築類型、建築型制以及建築樣式，構成了中國近代開埠城市和被租借城市的基本風貌（圖 6），儘管這些城市大多存在着舊城區，但已退居次要地位，形成以洋風建築為主的近代城市面貌。一些古老的舊城市，也出現了具有洋風建築特徵的新街區。這時期所引進的建築技術，特別是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應用，與歐洲幾乎是同步的。尤其值得提起的，從 19 世紀末開始，已經有不少外國建築師組成建築設計事務所來中國開業，他們一般具有成熟的業務技巧，設計古典式、折衷式以及其他各種樣式的建築物得心應手，並在設計教會學校建築時着手創造中國式新建築的探索。除了一些早期由傳教士指點或者房屋業主指點由中國工匠施工的不倫不類中西混合式樣的教堂和洋式店面以外，大部分經建築師設計的建築物，都具有一定的獨特魅力。本世紀前 20 年，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中國近代城市，在輸入和引進的西方近代新的建築類型和新的建築技術基礎上形成的近代新型建築及其所呈現的洋式建築風貌，說明了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傳統的建築體系逐漸衰落，一個新的建築體系已初步形成。

本世紀 20 年代開始，中國近代更進入了最後 30 年。在這一階段，20 世紀初已基本形成的中國近代建築體系也進入了成熟的階段：建築類型更為全面，建築技術有更為顯著的進展，建築型制更臻豐富。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大城市，城市建築的整體規模進一步擴大，出現大體量的高層建築和大跨度建築。西歐自 19 世紀下半葉起，為適應建築新技術的應用，特別是鋼和鋼筋混凝土的廣泛應用，開始探索擺脫古典樣式的羈絆，掀起了建築創新運動，第一次大戰前後至本世紀 20 年代逐漸成熟，出現了現代主義新建築。現代建築的發展進程在中國近代建築中，特別是在 30 年代，開始有明顯的反映，促進了中國近代建築體系的成熟和完善。

留學歐美專攻建築的最早一批留學生於20年代初學成歸來，中國建築師走上中國建築事業的舞臺，開始改變建築設計行業為外國建築師壟斷的局面。中國建築師為中國近代建築的發展，探求創造中國式的新建築做出了顯著貢獻，進一步完善了業已形成的中國近代建築體系。儘管在1937年以後，由於抗日戰爭爆發影響了中國近代建築的發展進程，但中國近代建築作為一個體系終於大體完成。傳統建築體系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不僅在開埠和租借地的城市，不少中等舊城也開始出現近代城市的新面貌，甚至在縣城，邊遠的山區也出現了“洋房”。

中國近代建築在這最後階段的發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在上海、天津、漢口等設有租界的大城市裏，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列強進一步增加資本輸出，在租界地裏又一次掀起建房高潮。如上海中山東一路黃浦江外灘，在經歷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一次重建後，進行了又一次重建，鋼筋混凝土結構代替了磚木結構，多層乃至高層建築代替了低層建築，23座建築物，除去兩座是建於上一世紀，8座建於本世紀初的以外，大半重建於二三十年代。其他如天津的英、法、日租界，漢口的英、法、俄租界，建築活動也十分頻繁。此外，加上中國的軍閥、官僚買辦和民族資本的投資，城市經濟有更大進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促進了房地產經營大幅增長，建築活動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

其次，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南京為政治中心，上海為經濟中心，於1929年分別製訂了《首都計劃》和《大上海都市計劃》。在《大上海都市計劃》中，提出擬在黃浦江下游開闢新市區，提出首先建設市中心，製訂了《市中心區域計劃》。在《首都計劃》《建築形式之選擇》一欄中提出“要以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最宜”，“公署及公共建築物，尤當儘量採用”。上海《市中心區域計劃》也規定“為提倡國粹起見，市府新屋應採用中國式建築。”於是，在南京、上海掀起了一個“復興固有建築藝術”的高潮。1928年收